



开放科学
(资源服务)
标识码
(OSID)

数字化公众参与对政府治理效能的影响及时空差异研究

——基于 85 个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分析

赖先进¹ 何新军²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 北京 100091;
2.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浙江建投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杭州 310013

摘要: [目的/意义] 本研究力图解决的问题: 作为公众参与新形态和新工具, 数字化公众参与能否显著地提升政府治理效能, 这种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和时间异质性吗? [方法/过程] 基于 85 个国家和地区 2013-2019 年跨国面板数据, 运用 STATA 软件, 尝试探究数字化公众参与对政府治理效能的影响。[结果/结论] 实证研究发现: 第一, 数字化公众参与、政府治理效能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这种关系具有稳健性; 数字化公众参与增长 1 个百分点, 政府治理效能增长 0.079 个百分点。第二, 数字化公众参与对政府治理效能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 在非 OECD 国家, 数字化公众参与对政府治理效能的影响更显著。第三, 数字化公众参与对政府治理效能的影响具有时间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 正相关性的影响程度呈增高态势。

关键词: 公众参与; 数字政府; 电子政务; 政府治理; 政府效能

中图分类号: D63, G35

Study on the Impact of Digital Public Participation on Government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and its Time-Space Difference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Analysis in 85 Countries and Regions

LAI Xianjin¹ HE Xinjun²

作者简介 赖先进(1986-), 博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 Email: laixianjin2005@163.com; 何新军(1976-), 高级工程师, 研究方向为环保工程技术与管理。

引用格式 赖先进, 何新军. 数字化公众参与对政府治理效能的影响及时空差异研究——基于 85 个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分析 [J]. 情报工程, 2021, 7(4): 55-64.

1.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hinese National Academy of Governance), Beijing 100091, China;
2. Zhejiang Construction Investment Group, Hangzhou 310013,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Significance]. The problems that this research tries to solve are: as a new form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new tools, could digital public participation significantly improve government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Does this effect have regional heterogeneity and time heterogeneity? [Methods/Process] Based on the cross-country panel data from 2013 to 2019 in 85 countries and regions, this study trie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digital public participation on government governance by STATA. [Results/Conclusions]. The empirical study found that: Firstly,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digital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government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and this relationship is robust; digital public participation increased by 1 percentage point, and government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increased by 0.079 percentage points. Secondly, the impact of digital public participation on government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is regionally heterogeneous. In non-OECD countries, digital public participation has significant impact on government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Thirdly, the impact of digital public participation on government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has a time effect.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the degree of influence of positive correlation is increasing.

Keywords: Public Participation; digital government; e-government; government governance; government effectiveness

引言

作为国家治理效能的重要组成, 政府治理效能的有效提升直接影响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如期实现。政府治理效能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重要影响因素。长期以来, 如何提高政府治理效能、加强政府治理效能建设对政府治理的影响, 一直是公共管理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关注的重要课题。目前的政府治理效能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两类: 一类是研究行政效能或政府效能本身。马春庆^[1]较早提出用“行政效能”取代“行政效率”, 并对行政效能概念进行了界定。卓越^[2]分析了行政效能建设的主要路径, 包括加强行政职业道德教育, 建构系统的行政责任制度, 优化行政审批制度等。另一类是研究行政效能或政府效能的影响。吴建南

等^[3]基于中国大陆 30 个省份 2004-2011 年的面板数据, 研究了效能建设对政府绩效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时间效应。臧雷振^[4]基于 1995 到 2015 年全球面板数据, 研究了政府效能对国家治理能力有着显著的正面促进作用。孙美佳等^[5]通过实证研究, 验证了行政效率对高层次人才集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总体上, 从公众参与角度, 研究行政效能或政府效能的研究成果较少。

作为新的公共管理现象, 公众参与正在政府治理的实践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尤其是随着信息化、数字化时代的到来, 数字化公众参与活动深刻影响着政府治理体系, 塑造和改变着政府治理行为、政府治理流程、政府治理绩效。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不少学者在研究中明确提出, 公众参与是提高政府效能的重要路径之一。崔建周^[6]认为, 效能政府建设要强化公众参与。但也有学者表达了对政府

治理中公众参与实际效果的关注。杨黎婧^[7]认为具有主观性的公众参与政府效能评价存在悖论。国内公共项目决策在公众参与的抵制下被迫取消的案例屡有发生，表明政府缺乏在公共参与环境下有效进行管理的习惯和技能^[8]。有的公共管理者虽然高度认同公共管理中进行公众参与的价值，但从实际效果上对公众参与的作用表示担忧和疑虑；有的甚至认为公众参与给政府治理带来更多的麻烦，会影响政府治理的效能。环评中的公众参与制度流于形式，反映出实践中存在对公众参与产生效能认识不到位的现象。公众参与对于政府治理效能的影响究竟是怎样的？在信息化、数字化条件下，数字化工具为公众参与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渠道和路径。数字化公众参与对政府治理效能的影响是怎样的？这是本文研究的逻辑出发点。

1 理论框架与假设

从内涵上看，政府治理是政府自身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政府治理市场的统称。因此，本文所指的政府治理效能（简称“治理效能”）是政府自身运行和治理效能、政府社会治理效能、政府市场治理效能的统一体。与传统的行政效能、政府效能相比，政府治理效能除关注政府自身运行效能外，还更加强调政府社会治理、政府对市场治理的效能。政府治理效能不同于成本-产出比较的效率评价，有多个维度的评价方式。公众参与对政府治理效能的影响也是从多个路径展开的。根据国家治理效能相关理论构建了数字化公众参与促进政府治理效能提升的理论框架，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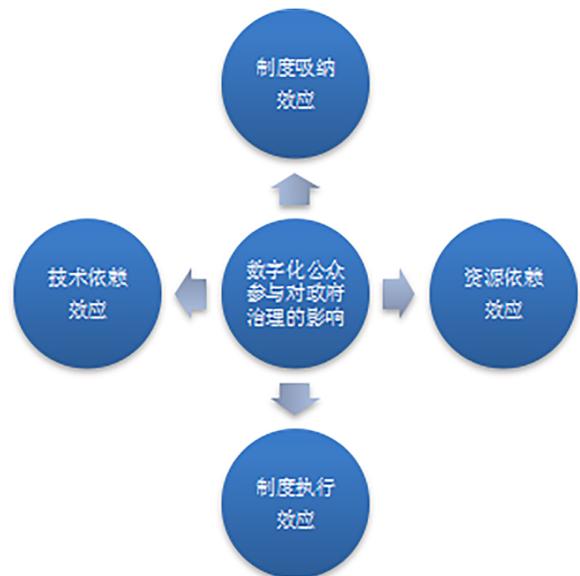


图1 数字化公众参与对政府治理效能影响的理论框架

1.1 数字化公众参与具有制度吸纳效应

高效的政府治理效能需要具备体制吸纳、制度吸纳特征。保持体制吸纳力、制度吸纳力（Inclusive institution）是防止国家失败、确保国家走向成功的关键原因^[9]。一种政治体制如果能够将社会各阶层有效地纳入体制，这样的政治体制就是强大的、有能力的^[10]。国家制度功能区分为制度吸纳力、制度整合力和制度执行力三种类型，制度吸纳力是首要的^[11]。公众参与是公众表达意见和诉求的渠道，也是政府治理对社会公众进行制度化吸纳的方式。依靠数字化工具和手段，政府治理的体制吸纳、制度吸纳效应会更强，传统政府治理遗留的排他性和榨取性也会得到改进和调整。在数字化公众参与制度吸纳效应推动下，政府治理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水平会更高，政府治理的执行力会更强，政府治理社会支撑会更有力量。

1.2 数字化公众参与具有制度执行效应

除制度吸纳力外，高效的政府治理效能还

需要具备强有力的制度执行力。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政府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执行是政府治理的基本职能。社会公众往往是政府政策执行的对象，也是公共服务供给的“顾客”。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公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意识和权利意识也逐步增强。现代社会，要提高政府执行力，必须得到公众的理解和认同。公众参与，既有利于提高公众对政府执行的接受度和认同度，也有利于政府把握公众的服务偏好和诉求。数字工具本身就是政府提高执行力的重要工具。数字化公共参与具有双重的制度执行效应。

理论假设 1：数字化公众参与，有利于强化政府治理的体制吸纳与制度执行，对于政府治理具有促进作用，数字化公众参与程度越高，政府治理效能越高。

1.3 数字化公众参与具有技术依赖、资源依赖效应

不同于一般的公众参与活动，数字化公众参与是公众借助信息化、数字化工具和技术进行公共事务参与的过程。数字化工具和技术在影响公众参与的效果上具有重要作用，即数字化公众参与具有技术依赖效应。当数字化工具和技术随着时间的发展日益走向成熟，数字化公众参与工具对政府治理效能的作用也将更大。

理论假设 2：数字化公众参与对政府治理效能的影响受到技术水平和条件的限制，具有时间效应；随着信息化数字化技术的发展，数字化公众参与对政府治理效能的影响更显著。

公众参与对政府治理效能的影响具有资源

依赖效应。现代政府治理体系是一个开放而非封闭的治理体系。公众参与活动受到外部环境条件的影响，尤其是经济条件和环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作为政府治理体系这一上层建筑中的活动，公众参与的有效性必然也受到经济发展条件的制约。

理论假设 3：数字化公众参与对政府治理的影响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具有区域异质性；对于经济发达的地区，数字化公众参与对政府治理效能的影响更显著。

2 数据与计量模型

2.1 变量、测量指标及数据来源

2.1.1 被解释变量-政府治理效能

政府治理效能是政府在公共治理活动中所体现和发挥的功能。本文采用政府有效性作为政府治理效能的评价指标。目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创新指数、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数都对政府有效性进行全球性的评估。考虑到全球范围内对全球创新指数具有较高的认可度和可接受度，本文采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创新指数中的政府有效性对政府治理效能进行表征。

2.1.2 解释变量-数字化公众参与

数字化公众参与是公众利用数字化、信息化工具进行在线参与的活动。目前，对数字化公众参与进行科学评估的成果主要来源于全球创新指数中运用的一个指标。因此，本文也采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创新指数中数字化公众参与指标进行直接表征。

2.1.3 控制变量

参考现有相关的研究，考虑到各变量的共线性和取值的统一性，论文采用经济增长、财

政资源、社会就业、人民生活、国际贸易作为控制变量。控制变量各指标与数据均来源于IMF数据库，时间长度为2013-2019年，见表1。

表1 主要变量、指标与数据来源

变量类型	名称	指标	时间跨度	数据来源
被解释变量	政府治理效能	政府有效性评分（百分制）	2013-2019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创新指数评价 ^[12]
解释变量	数字化公众参与	电子化公众参与评分（百分制）	2013-2019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创新指数评价 ^[12]
控制变量1	经济增长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2013-2019	IMF数据库
控制变量2	财政资源	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	2013-2019	IMF数据库
控制变量3	社会就业	失业率	2013-2019	IMF数据库
控制变量4	人民生活	通胀率	2013-2019	IMF数据库
控制变量5	国际贸易	进出口变化率	2013-2019	IMF数据库

2.2 研究模型的建立

为验证数字化公众参与对政府治理效能的影响，设定如下计量模型：

$$\text{Governmenteffectiveness}_i = A + B_1 * \text{Eparticipation}_i + B_2 * \text{GDPpercapita}_i + B_3 * \text{Taxrate}_i + B_4 * \text{Unemploymentrate}_i + B_5 * \text{Inflationrate}_i + B_6 * \text{Traderate}_i + C_i \quad (1)$$

Governmenteffectiveness_i 表示地区中 i 年度政府治理效能，B₁-B₆ 代表为各个因素变量对年度政府治理效能的弹性系数。以 B₁ 为例，当 Eparticipation 增加 1 个百分点时，Governmenteffectiveness 系数将增加 B₁ 个百分点。A 为常数

项；C_i 为随机扰动项。各变量单位均为百分制，解决了其他计量模型分析中存在的单位取值不统一的问题。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运用数据分析软件工具 Stata 对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主要变量数据的统计特征描述，见表2。为检验各变量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对其进行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平均膨胀因子为 1.09，每项膨胀因子均在 1 左右，小于 10，证明各变量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2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表

序号	变量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1	Governmenteffectiveness	594	56.67828	22.64639	3.5	100
2	Eparticipation	582	59.42887	25.79661	2.6	100
3	GDPpercapita	595	5.267576	5.540002	-28.0781	36.98789
4	Taxrate	595	32.6759	11.01598	10.897	72.26
5	Unemploymentrate	595	7.545429	5.000542	0	27.527
6	Inflationrate	586	742314	7076490	79.202	1691.42
7	Traderate	595	3.747576	5.220028	-21.1155	36.263

3.1 整体计量与稳健性分析

为了确定哪一种回归结果更合适,首先对方程进行了豪斯曼检验。豪斯曼检验结果表明,卡方值为 32.87, P 值 = 0.0000 < 0.01, 这说明接受原假设,研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更为准确。

为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同时探求各解释变量的解释能力大小,研究首先用数字化公众参与作为初始解释变量,利用方程(1)进行回归,然后按照先后变量排列顺序逐步加入其他解释变量,最后形成方程(6)的回归结果,见表3。

表3 方程(1)-(6)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方程(1) 固定效应	方程(2) 固定效应	方程(3) 固定效应	方程(4) 固定效应	方程(5) 固定效应	方程(6) 固定效应
Eparticipation	0.0903445 (0.00933)***	0.0892958 (0.0093741)***	0.0892392 (0.0094049)***	0.0101107 (8.24)***	0.0793217 (0.0103503)***	0.0796118 (0.0103588)***
GDPpercapita		0.0588277 (0.0523682)	0.0591309 (0.0525309)	0.046613 (0.0530434)	0.0326427 (0.0534181)	0.0222777 (0.0547966)
Taxrate			-0.0088715 (0.0995462)	-0.0258327 (0.0999704)	-0.0194743 (0.1003951)	-0.0249202 (0.1006259)
Unemploymentrate				-0.1587757 (0.1002655)	-0.1879996 (0.1022065)*	-0.1879713 (0.1022351)*
Inflationrate					0.000000172 (0.00000008)**	0.000000156 (0.0000000821)*
Traderate						0.0348398 (0.0408337)
C	51.0665 (0.5789288)***	50.81772 (0.6196986)***	51.11133 (3.352458)***	53.28608 (3.618136)***	53.78196 (3.632616)***	53.87836 (3.635391)***
Obs	582	582	582	582	573	573
F 值(P 值)	93.77 (0.000)	47.54 (0.000)	31.63 (0.000)	24.42 (0.000)	20.32 (0.000)	17.05 (0.000)

注:表中回归系数下方小括号内为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差;***、**、*表示回归系数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统计显著。

方程(1)回归结果显示,在不引入其他变量的条件下,数字化公众参与和政府治理效能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数字化公众参与增长1个百分点,政府治理效能增加0.09个百分点,显著性水平为1%以内。在逐步引入其他变量后,方程(2)~(6)的回归结果显示,数字化公众参与均与政府治理效能均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显著性水平均在1%。根据方程(6)显示,引入所有变量后,数字化公众参与增长1个百分点,政府治理效能增长0.079个百分点。显著正相关的结论也得到了散点图的支持,见图2。根据散点图,数字化公众参与增长与政府效能

提升具有线性拟合关系。

3.2 分区域计量

为进一步验证数字化公众参与对政府治理效能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论文分别对37个OECD国家、地区和48个非OECD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分组固定效应分析。回归结果表明,数字化公众参与对于非OECD国家和地区政府治理效能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影响;非OECD国家数字化公众参与提升1个百分点,政府治理效能将提升0.116个百分点,显著性水平在1%以内;而对于OECD国家和地区,显著性水平不高,

见表 4。无论是对 OECD 国家和地区，还是对非 OECD 国家和地区，数字化公众参与都有正相关影响，但在显著性水平上，对非 OECD 国家和地区的影响更显著。这表明论文的区域异质性假设成立。这种区域异质性主要体现在 OECD 国家和地区、非 OECD 国家和地区之间。显著性水平对比表明，资源依赖假说在分析数

字化公众参与对政府治理效能影响时不能成立。可能的解释是，OECD 国家和地区社会公众参与的水平已达到较高的水平，非 OECD 国家和地区社会公众参与仍然有较大的空间。相比而言，在非 OECD 国家和地区，数字化公众参与促进政府治理效能提升的空间更大、提升的显著性更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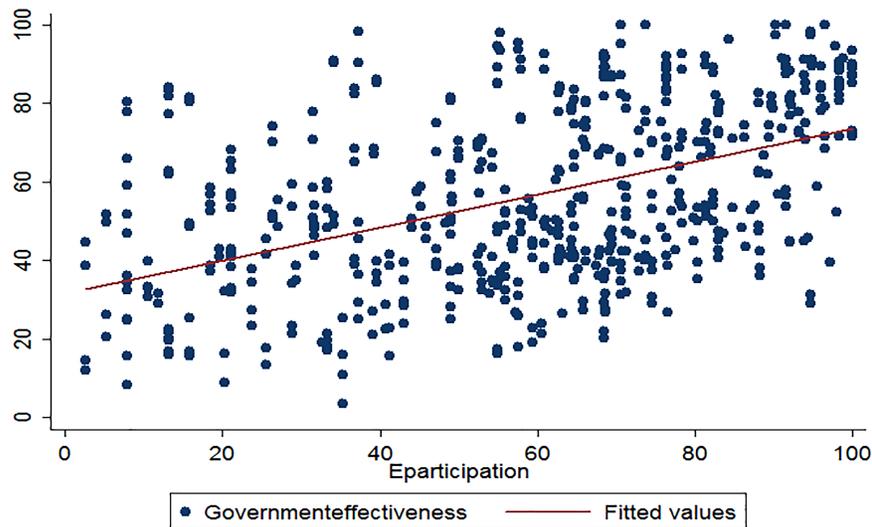


图 2 数字化公众参与和政府有效性的拟合图

表 4 分地区的固定效应回归分析

变量	OECD 国家	非 OECD 国家
Eparticipation	0.0137469(1.21)	0.116404(0.0150138)***
GDPpercapita	0.0551356(0.1005044)	0.038135(0.0707268)
Taxrate	0.3654991(0.1326072)***	-0.1918963(0.137677)
Unemploymentrate	-0.5325448(0.1383697)***	-0.137753(0.1418009)
Inflationrate	-0.0112701(0.0161917)	0.0000000961(0.0000000974)
Traderate	-0.0172591(0.0701539)	0.0524828(0.0537852)
C	64.06016(5.705787)	42.26929(4.295655)***
Obs	259	314
F 值 (P 值)	7.30 (0.000)	13.91 (0.000)

注：表中回归系数下方小括号内为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差；***、**、* 表示回归系数在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统计显著。

3.3 分时间阶段指标计量

为测量数字化公众参与对政府治理效能影

响的时间效应，将 2013 年设定为参照组，进而分年度产生回归结果（见表 5）。结果显示，

每年数字化公众参与对政府治理均有显著的正相关影响,显著性水平都在1%以内。除2018年影响系数有所下降外,2013-2019年每年数字化公众参与对政府治理效能的影响系数,呈现逐年增高的态势。这一研究表明,数字化公众参与对政府治理效能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显示成效,即影响具有时间积累效应。原假设得到了验证。此外,2013-2019年中,2018年的影响系数为正,但相比之前年份有所下降。可能的解释是,2018年全球发生了美国商务部制裁中兴、数据信息泄露等互联网发展的重大事件,影响了数字化公众参与的发展,也影响了其对政府治理效能的提升。该结论也表明,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数字化公众参与对政府治理的积极影响还将增强。强化数字化公众参与,提高政府治理效能,成为今后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一个有效的政策选项。此外,从相关系数看,2015年是相关系数的分水岭,2015年前,数字化公众参与对政府治理效能的影响系数在0.33~0.34范围;2015年后,数字化公众参与对政府治理效能的影响系数基本提升到0.5左右。可能的解释是,2015年以后,面对互联网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政府数字化转型加速推进,各国政府治理逐步导入了数字化工具,数字化公众参与对政府治理的影响也更加深刻。

表5 分时间回归计量结果

变量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Eparticipation	0.3335326 (0.0762299)***	0.346486 (0.0771221)***	0.4998063 (0.0876627)***	0.5160374 (0.0940565)***	0.53689 (0.0987637)***	0.477441 (0.0988026)***	0.5612031 (0.1009411)***
GDPpercapita	-1.607876 (0.448796)***	-0.9011544 (0.565372)	0.299031 (0.3095419)	-0.6908962 (0.4051536)*	-1.273089 (0.3926901)***	-1.016455 (0.3149536)***	-0.2468821 (0.3342697)
Taxrate	0.6089369 (0.1957561)***	0.7314494 (0.2121875)***	1.061817 (0.1763204)***	0.9601782 (0.1720045)***	0.516278 (0.1647027)***	0.584808 (0.1576925)***	0.5894885 (0.1605169)***
Unemploy- mentrate	-0.1945417 (0.3911798)	-0.0722927 (0.4074164)	-0.4336681 (0.367958)	-0.6045315 (0.3836889)	-0.4741758 (0.3456204)	-0.5509188 (0.3396416)	-0.5722407 (0.3520296)*
Inflationrate	-0.00000112 (0.00000058)*	-0.00000201 (0.000000582)	-0.000000459 (0.000000359)	-0.00000017 (0.000000285)	-0.000000104 (0.000000226)	-0.000000345 (0.000000178)	-0.000000226 (0.000000164)
Traderate	-0.0609777 (0.4399367)	0.5022353 (0.4321393)	0.627711 (0.264255)**	0.6688661 (0.4145662)	-0.3695844 (0.3691307)	-0.0364892 (0.45577)	-0.2376462 (0.4691835)
C	30.10987 (9.491432)***	20.72969 (9.75664)**	-7.411452 (7.913477)	-1.319878 (9.213128)	17.96571 (8.87787)**	18.29707 (8.239755)**	2.482932 (9.153815)
Obs	80	80	82	82	83	83	83
F值(P值)	11.91(0.000)	9.72(0.000)	15.81(0.000)	14.40(0.000)	18.11(0.000)	16.80(0.000)	15.02(0.000)

注:表中回归系数下方小括号内为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差;***、**、*表示回归系数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统计显著。

4 主要结论与启示

4.1 主要结论

数字化技术和手段,为公众参与政府治理、政府与社会协同治理提供了有效的实现工具。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数字化公众参与

和政府治理效能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种关系具有稳健性;数字化公众参与增长1个百分点,政府治理效能增长0.079个百分点。这表明,数字化公众参与不是政府治理的“负担”,而是提高政府治理效能的一条重要的“捷径”和支撑。数字化公众参与本质上具有有序

的秩序特征，能够提升政府治理效能。在这点上与无序化的公众参与形成鲜明对比。公众参与政府治理的实现，不仅需要制度设计，还需要数字化技术和工具的有效引入。后者在效果上具有显著的影响。另一方面，数字化公众参与对政府治理效能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在非OECD国家，数字化公众参与对政府治理效能的影响显著。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要运用数字化技术和工具，发挥公众参与对政府治理效能的积极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数字化技术向智能化、智慧化方向的深度发展，数字化公众参与对政府治理效能影响更加显著。实证研究表明，数字化公众参与对政府治理效能的影响具有时间效应；2015年以后，数字化公众参与对政府治理效能影响显著性水平更高。在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要抓住契机，探索和实现公众参与数字化的实现形式，提高政府治理效能。

4.2 政策启示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国面向2035年和2050年国家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治理效能的提升对于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上述结论对我国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政策启示：

4.2.1 加强公众参与制度建设，为数字化公众参与赋能政府治理创造良好的体制机制环境

近年来，我国政府治理效能正呈现逐步增长发展态势；但总体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相比尚有不少差距。根据实证研究结果，要加强公众参与，尤其是数字化公众参与，发挥其对政府治理效能提升的积极影响。实证研究表明，随着

时间的推移和技术进步，公众参与和政府治理效能的正相关影响系数将更高。这表明，强化公众参与，提升政府治理效能具有时间上的紧迫性。作为非OECD国家，强化数字化公众参与，对于提升我国政府治理效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发达国家的实践看，电子化、数字化公众参与已在公共管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比如，英国在城市规划体系中注重电子化公众参与^[13]。在政府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应加强公众参与相关的制度建设。政府信息公开是满足公众知情权和参与权的第一步。政府信息公开是公众了解政府、监督政府的基础性制度和前提性条件^[14]。应重点强化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设，为公众参与公共治理提供充分的信息基础。按照《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落实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的制度性安排，切实把公众参与作为重大行政决策的必经环节。推进环境保护、城市规划、价格调整等重点领域的公众参与制度建设。比如，在环保领域，优化环评制度中的公众参与机制，防止形式化道具化现象，提高环评公众参与的治理效能。

4.2.2 推进公众参与活动、公众参与工具的数字化，进一步实现政府治理数字赋能

相比传统的公众参与方式，数字化公众参与具有许多优势和特点：第一，参与面广。大量、海量的公众参与能够在数字化条件支撑下得以实现。第二，参与过程产生冲突和摩擦风险小。相比较于面对面的公众与政府之间参与活动，在缺乏有效组织和制度安排条件下，容易受到情绪等因素影响演变成官民摩擦或冲突，甚至走向非制度化冲突。第三，参与的分众化、精细化程度高。实践中，以利益相关者为中心的公众分类管理是政府引导和管理公众参与的难

点。依托数字化工具,恰好能够有效实现利益相关者的识别、联系,提高公众参与的精准度。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在数字化新时代,应增强公众运用数字化媒体工具进行公众参与的意识,提高社会公众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和互动性。比如,政府应通过优化用户体验、落实办理成效等方式,使公众参与互动、享受互动并受益于互动^[15]。凭借数字政府建设契机,开发支撑数字化公众参与的技术、信息平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数字政府建设。依托数字政府建设契机,政府职能部门应结合公众参与的实践需要,开发专门的信息平台或在数字平台中开发公众参与的应用场景,提高公众参与的便利性、回应性、有效性。面对数字化公众参与的新情况、新问题,制定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公众参与的制度规则,不断提升政府治理效能。政府应积极运用人工智能等智能化、智慧化技术,对数字化公众参与结果进行分析研判,提高政府治理的智慧化、科学化水平。

4.3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文的研究不足和局限主要体现在:

(1) 采用国际组织评价报告指标衡量数字化公众参与、政府治理效能,缺乏对各国真实情景的感知和掌握;

(2) 由于数据完整性的考虑,论文样本量为85个国家和地区,与全球经济体总体样本相比有一定欠缺。基于论文的研究,虽然数字化公众参与对政府治理效能影响有区域异质性,但究竟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区数字化公众参与对政府治理效能影响是否有规律性?呈

现怎样的规律?这需要未来进一步的研究阐释和分析。

参考文献

- [1] 马春庆. 为何用“行政效能”取代“行政效率”——兼论行政效能建设的内容和意义[J]. 中国行政管理, 2003(4):28-30
- [2] 卓越. 论行政效能建设[J]. 福建行政学院福建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2(3):18-22
- [3] 吴建南, 胡春萍, 张攀, 等. 效能建设能改进政府绩效吗?——基于30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 公共管理学报, 2015(3):131-143.
- [4] 臧雷振. 政府治理效能如何促进国家创新能力:全球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 中国行政管理, 2019, 403(1):123-129.
- [5] 孙美佳, 胡伟. 政府行政效能对高层次人才集聚的影响研究[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16(5):117-122
- [6] 崔建周. 效能政府建设应强化公众参与[J]. 理论探索, 2008(3):124-126
- [7] 杨黎婧. 公众参与政府效能评价的悖论、困境与出路:一个基于三维机制的整合性框架[J]. 南京社会科学, 2019(9):71-78.
- [8] 黄小勇. 公共决策的公众参与困境及其管理策略——以广东番禺区垃圾焚烧发电厂风波为例[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0(5):114-118.
- [9] 德隆·阿西莫格鲁, 詹姆斯·A. 罗宾逊.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M].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5
- [10] 杨光斌. 衡量国家治理能力的基本指标[J]. 前线, 2019(12):45-48
- [11] 宋世明.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框架[J].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9, 23(6):5-13
- [12]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全球创新指数评价分析数据库[EB/OL]. (2021-02-03) [2021-02-03]. <https://www.globalinnovationindex.org/analysis-indicator>.
- [13] Richard Kingston. 王瑞雪, 译. 电子化公众参与在英国新型地方规划系统中的作用[J]. 电子政务, 2009(10):127-141.
- [14] 刁伟涛, 任占尚. 公众参与能否促进地方债务信息的主动公开——一项准实验的实证研究[J]. 公共行政评论, 2019, 12(5):93-114.
- [15] 纪媛媛. 数字化公众参与的理念与创新[J]. 社会科学前沿, 2016, 5(2):349-355.